

# 绿邮筒与泛黄的家书

□刘那全

20世纪60年代的北方村庄,贫穷像黄土一样厚重。村里认字的人少,我才上小学三年级,就成了左邻右舍的“小先生”。那些沾着汗渍的信封上,总写着几个刻进记忆的地址:宣化烟筒山、东北碾子山、银川东方红拖拉机厂……

去普奶奶家写信是件郑重的事。她总要摆出那张磨光的木桌,擦了又擦,再点上煤油灯。我盘腿坐在热炕头,她一句一句地说,我一字一字地写。她说“夜来个”(昨天),我便得在脑子里翻找合适的字代替。灯花爆了,暗下去了,她就用缝衣针轻轻一拨,火苗又颤巍巍亮起来,映着她眼角细密的皱纹。“这孩子识文断字,”她总念叨,“将来准是当先生的料。”村里人管两种人叫先生:教书匠和救命的大夫。

我写的信总是那几句套话:“见字如面,家中一切安好,勿念。”最要紧的是报平安,尤其是收了汇款的时候——在外工作的人省下粮票、攒下津贴,一张汇款单就是一家人半年的指望。回信总要写上“钱已收到”,再叮嘱“在外保重,好好工作”。

贴好8分钱邮票的信,先放在大队供销社的柜台。隔三岔五,会有邮差来取。

上中学后,我每天徒步4公里路过长丰街。街心邮政所门口,挂着一个绿色的邮筒,中国邮政4个黄字已被风雨磨淡。我成了它的常客——前后院婶子大娘的信,都托我顺路投进去。邮筒铁皮冰凉,投信口像一张沉默的嘴,信落进去时发出轻微的“噗”声,仿佛一句被吞下的叹息。戴白套袖的供销社老服务员一见我就笑:“又寄信啊?”

许多年后,当我用手机瞬间收到千里外的视频,总会想起那个绿色的邮筒,通信的变迁何尝不是一部微缩的家国史?那些等信的焦灼、盼归的辗转、相见时粗糙而汹涌的喜悦,都封存在旧时光里,如同珍藏于抽屉深处的信笺,纸已泛黄,墨香犹在。



# 缝纫机

□耿顺东

娘有一台缝纫机,放在阳台的角落里。这台缝纫机的年龄有60岁了,比我大5岁。

娘生在农村,是家里的独生女,在那个物资匮乏、日子拮据的年代,她与同龄人一样,尝遍了吃穿用度上的艰辛;但平凡岁月里,也有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幸福时光。

那时候生活水平低,人们穿衣服都是自己买布找裁缝来做。娘也跟着琢磨起做衣服的手艺,我问娘是怎么学会的?娘说是跟老姨学的。老姨是姥姥的亲妹妹,与我家是邻村,一手针线活做得精巧细致,对娘也是手把手地教。娘学会了做各式各样的衣服,都是老样式的,这些衣服现在只能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才能看到。

娘学会做衣服后,一直盼着能有一台自己的缝纫机。那年家里攒了一年的收入,整数是150元。姥爷就带着娘特意去石家庄的商场里买,到了一看,品牌有好几个,价格最低的“五一”牌卖145元。姥爷和娘一商量,别管好赖,就买这个了。这台缝纫机一直用了几十年,愣是没出过毛病。

村里为发展集体经济、方便乡亲们,办起了好几个副业摊,缝纫组就是其中之一。娘凭着一手好针线活,同村里其他会做衣服的女同志一起,加入了缝纫组。缝纫组总共五六个人,分工明确,有负责量身裁剪的,有负责缝纫的,有负责熨烫的,还有负责登记算账的,娘负责缝纫。乡亲们凭布票从供销社买来布料,就到缝纫组来做衣服,缝纫组做好了收几角钱的加工费,收入算村大队的;缝纫组的组员根据出工挣工分,年终按工分多少算工钱。缝纫组最忙的时候要数春节前,那时候人们就是再节俭,过年也要给家人做一身新衣服。活儿少的时候,缝纫组的组员就回家干农活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娘同爹商量,在家开起了缝纫铺,农忙之余替人家做衣服。日子一天天往前走,社会发展得快,乡亲们的收入逐年提高,做新衣服的次数就越来越多,娘做缝纫的收入慢慢成了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
娘的手艺好,找上门的活儿自然就多。白天干不完,人家催得急,只能熬夜赶工。当时的农村供电不足,只有等后半夜,用电量小的时候才给村民家里送电,其实乡亲们已经不需要了,唯独我家盼着,娘就可以在电灯下做缝纫。娘大多时候都是前半夜先睡觉,等后半夜有电了再做缝纫,长期作息时间紊乱。冬季天气寒冷,大半夜起床干活,时间久了患上胃病,吃了好多年胃药也不见好,直到后来不在晚上干活了才一点点缓过来。

春节前,家家户户的年货都赶制完毕,正月里便没了做衣服的活儿。娘就在家开了缝纫班。她先亲手绘好裁剪图样,再找人把图样油印成册,当作教材。每年正月,这样的缝纫班总要办上几期,不少乡亲靠着这门手艺,实实在在改善了生活。娘做了几十年衣服,全村几代人大多都穿过她做的衣裳。后来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村里,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村里集市上冒出好多家卖成衣的商铺,样式多、价格便宜;后来卖布料的越来越少了,再买布做衣服就不划算了。另外,现在年轻人追求样式新颖时髦,娘也做不来,我们都劝娘别做衣服了,缝纫机就成了家里的摆设,偶尔自家修改衣服时备用。

多少次听到收旧家具电商的吆喝声,娘都舍不得卖,我知道这台缝纫机承载着她太多的回忆。看到它,我能够想起姥爷为买它在田间辛勤的劳作,能够想起姥姥半夜怕娘累了给娘做饭的炊烟,能够想起它给一家人带来的沉甸甸的希望。

每次回老家看娘,总爱拉着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。我总装作不经意的样子,提起那台缝纫机的旧事。其实那些话,娘已经讲过好多次了,可我总爱帮着娘再回忆一遍,每当那时我能看到娘眼里有闪烁的光。

# 怀念爷爷

□方敬军

爷爷有个接地气的小名,叫二坏,是长辈们盼着他好养活才取的。爷爷的大名叫方炳林,是2017年去世的,走得很突然,但很安详,那年他93岁高龄。

爷爷任村支书期间,修通出村路、上变压器、兴修水利(打井、修水渠)、平整土地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。同时,开办了村大队卫生诊疗点、供销社、磨面房、榨油房、轧棉花房等服务业,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活。特别是1958年,由于工作突出,在天津市召开的会议上,他作为优秀代表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在“瓜菜代”的特殊历史时期,一方面,他积极执行上级政策,一方面,结合实际,科学应对,由于措施得力,我村在这一时期平稳度过,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广大群众的好评。

爷爷一辈子勤劳,热爱劳动,一直到八九十岁还下地干活儿,从春夏到秋冬,一年没有闲工夫儿。因此,无论是夏粮,还是秋粮,以及花生、黄豆、谷子等杂粮,年年高产收成丰厚,不仅够吃,除了留下来年的种子和余粮,还能卖掉挣钱。我认为,在那个年代爷爷也算得上是种地的把式。

爷爷心灵手巧,非常热爱生活。他会做饭炒菜,做的饭可口好吃,炒的菜香味直飘;烙饼、擀面、包饺子、炸果子样样拿手;下挂面炆葱花加肉片做出来的汤特好喝,就是看上去很简单的熬小米粥,只要经过他的手,做出来也是香喷喷的,喝到嘴里、下了肚那叫一个“爽”!特别是炒花生,炒出来看不见火花,似未熟的生花生,可吃起来那味道简直地道极了!再就是过年时他腌制的猪肉,吃了一顿还想吃两顿,且他腌制的猪肉不光好吃、色泽好,而且能一直吃到年尾。这些还不够,爷爷的绝活儿是腌臭鸡蛋和做臭豆腐,那味道,真是闻而不臭,吃起来嘛嘛香!说实话,现在,我去过的地方很多,也见过很多,吃过各地方做的臭鸡蛋和臭豆腐,毫不夸张地说,没有爷爷做得好,更没有爷爷做的那个味儿!

爷爷在世时,总是谆谆教诲,时时告诫我们,要好好学习,努力工作,多做贡献。总结爷爷的一生,虽历经挫折、折磨、迫害和坎坷,但他从没有被打倒,而是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气概和顽强毅力,坚韧的品质和气度,宽广的胸怀和不屈的意志,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砥砺前行,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和目标。我认为,爷爷相信光明在前!

# 母亲的糊涂账

□许书玉

母亲一生都在和柴米油盐较劲,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。可唯独遇到我的事,总能算出一笔糊涂账。

前几天,她风尘仆仆地来到我家门口,一只手拎着一个装满了东西的超市最大号的塑料袋,袋子被撑成了饱满的球形;另一只手提着那只她念叨了好几天的走地鸡;肩背上还背着一个塞到变形的旧双肩包,身后还有两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。母亲的肩膀,因为常年劳作而微微有些内扣,此刻被双肩包压得更低了。我实在无法想象,她是如何辗转两个小时,折腾到我这里的。她总是如此,恨不得将故土所有的丰饶与暖意,都打包成这沉甸甸的爱,尽数倾囊予我。

想起我小学三年级时,班里流行骑自行车,我也很想拥有一辆,可一辆自行车要母亲半个多月的工资,母亲看着我渴望的眼神,犹豫了一会儿,从衣柜最深处掏出一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,坐到床沿,小心地解开布包上的死结,掀开一层旧报纸,露出一沓压得平平整整的票子:有10块的,5块的,甚至还有一沓5角的。她一张张细细地数,数完一遍不放心,又重新数了一遍,摩挲了许久后,她

深吸一口气,把这沓钱紧紧攥在手里,带我去了车行。当那辆红黄相间的自行车被推出来时,我激动得围着车转了好几圈。母亲看到我满足的模样,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那一刻,我才懂,于她而言,我的快乐和自尊,永远高于她辛苦赚来的钞票。

岁月流转,母亲的糊涂账非但没有算清,反而在我人生的脆弱时刻,添上了最厚重的一笔。前年,我生了宝宝,产后的虚弱和育儿的焦虑让我几近崩溃,但想到月嫂费用昂贵,决定咬咬牙挺过去。母亲知道后,立马给我打了一大笔钱,还拨打视频通话给我。视频里,她的身后是家里那盏昏黄的老顶灯,身上还系着看不清花色的旧围裙,大概是刚从灶台边冲过来的。她眉头拧成了疙瘩,声音急得有点发颤:“妈当年生你没条件,落了一身病根儿,现在妈手里有钱了,绝不能让你再遭那个罪!”那一刻,我鼻子猛地一酸,记忆里那个为了省几角钱菜钱都要跟小贩磨半天嘴皮子的母亲,此刻却豪气得像个慷慨大方的大富豪。在我最需要的时刻,母亲总是毫不迟疑地捧出她所有。

母亲的账,于她自己是锱铢必较的清苦算计,但对于我,是算不清的糊涂账,是无论走多远都有人托底的勇气。

本版邮箱:yzwbwszh@163.com